

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陈红民 傅 敏

南京大屠杀是1937年日本军队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之后发生的屠杀大量中国无辜平民与放下武器士兵而引起中外关注的重要历史事件。几十年来,关于此事件的研究与争论不断,甚至成为影响当代中国与日本关系的一个因素。^①以此有争议事件的研究作为一个例证,来探讨近代以来冲突不断的东亚地区(尤其是中日之间)进行历史对话与和解的可能性,应该是恰当的。本文主要介绍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主要成果与研究前景展望。^②

* 本文初稿曾在哈佛—燕京学社主办的“Historical Dialogue and Reconciliation in East Asia: Recent practice and future prospects”会议(2008年9月12-13日,哈佛大学)上宣读,承评论人Elizabeth Perry(裴宜理)教授、Andrew Gordon教授提供意见,发表时做了重要修改补充。2008年10月17日,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进行演讲。写作过程中,得到张连红教授、朱成山馆长的惠助,谨此致谢。

- ① 在中国与日本两国之间有一些历史与现实纠缠的问题,除南京大屠杀外,还有钓鱼岛归属、日本教科书中有关的记载、慰安妇、民间的索赔及日本政府要员祭拜靖国神社等。
- ② 许多学者从不同侧面总结过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以下的成果对本文有启发:高兴祖:《五十八年回顾:日本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争论》,《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高兴祖:《“南京大屠杀”事件研究现状和今后的课题》,《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陈安吉:《“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历史回顾和今后的任务》,《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张连红、许书宏:《近几年来国内南京大屠杀研究综述》,《江海学刊》2000年第5期。王秀霞:《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中南京国际安全区”研究的历史回顾》,《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李寒梅:《中国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研究》,《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8期。张卫波:《近十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述评》,《中共党史资料》2006年第3期。王希亮:《日本学术界“南京大屠杀事件”论争及各派论点评析》,《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4期。张连红:《中日两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整理与出版,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事件发生当时至 1940 年代末,史料的形成阶段。1937 年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中外的新闻媒体有相关的报道,当时人也留有书信、日记及影像等资料,但比较零散,更未结集出版。较出名的史料是 1938 年英国记者田伯烈(H. J. Timperley)写成的“*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Modern Age Books Inc. London, New York)被中文译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出版。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曾组织战争损失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在华战争罪行给予确定,南京大屠杀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均形成了一批重要的法律资料。然而,由于中国随即陷入激烈的内战与接踵而来的两岸对峙,1949 年后在“革命史观”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大陆史学界,几乎没有学者研究发生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这场大屠杀,也没有人整理出版相关史料,大量资料淹没,以至几十年后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重新收集整理。^①

第二阶段,1980 年代初至 1990 年代末。南京大屠杀相关史料长期缺少关注的情况在 1980 年代初期开始改观,到 1990 年代末出版整理南京大屠杀史料的工作达到一次高潮。外在的起因是日本出现以在教科书中否认日军在南京暴行为代表的系列事件,内在原因则是中国民间民族主义的兴起,影响到了史学界,“民族

① 南京大学有学者在 1960 年代开始进行田野调查,整理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资料,1962 年编成《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但只是内部出版,其成果到 1980 年代前并未公开出版。

主义史观”在某些研究课题上取代了“革命史观”。

1982 年,日本有关历史教科书将“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国,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认为此举意在否定侵略中国与南京大屠杀的事实。1983 年底,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组织力量对南京大屠杀进行全面的调查。由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南京博物院联合举办“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证展览”,并开始相关史料的整理。1984 年,南京市成立了“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对幸存的大屠杀受害者与目击者进行调查,并选择其中 104 名受害者的证词,编辑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年)。该委员会后又编辑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集》(1985 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成为关于南京大屠杀较系统的史料。

1985 年,南京市建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为收集、研究与陈列南京大屠杀资料的专门机构。该纪念馆以后曾经过两次大的改建、扩建工程。

1995—1997 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40 周年、抗日战争爆发与南京大屠杀发生 50 周年,又出版了一批新的史料,在内容的深度与广度上有相当的扩充。主要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收录 642 位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目击者的证言;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吉林社会科学院联合编辑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中华书局 1995 年 7 月),全书 80 余万字,较完整地呈现了相关的档案史料。

1990 年代对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整理与出版,还有两个突出的新特点:一是系统地出版了一批参加与目击大屠杀的外国人的日记、书信等资料。最突出的是:《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9 年)、《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年)、《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利用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编辑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东史郎是1937年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二十联队的士兵,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中国的代表,南京大屠杀发生时,他与一些外国人组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推选为主席,营救了许多中国人。魏特琳(Minnie Vanttrin)的中文名字是“华群”,1937年为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教育系主任兼教导主任,南京大屠杀期间曾在校园里收容无辜市民,尤其是妇女,被称为是“活菩萨”。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是金陵大学历史系主任,南京沦陷时,他以副校长名义负责留守校产,发起组织“南京国际安全区”,又是“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骨干与最后一任主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则汇集了美、德、日等外国人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包括档案、日记、书信、新闻报道与法庭证言等六个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从加害者与第三国目击者的立场来反映南京大屠杀及其过程,在反击否认南京大屠杀时显得尤为有力。二是发掘出大量珍贵历史图片,出版了几本图片集,如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南京大屠杀图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共收图片800余幅,并附考评与说明性文字5万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收录图片近800幅;还有《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中的见证》(海南出版社1999年)等。图片在反映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时,有着文字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第三阶段,进入21世纪,关于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整理工作取

得了重要进展,由南京大学联合驻南京地区高校、科研机构与档案部门编辑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从 2005 年起陆续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出版传媒集团出版,目前已分三批出版了 55 卷,约 3 千万字(目前仍在进行中)。这部大规模的资料集,不仅包括了此前已经出版的所有资料,而且新增了大量原始的历史资料,包括了受害方中国、加害方日本及第三方国家的档案、历史文献,新闻报道、日记、书信等,还有幸存者的口述史料与当时国民政府所做的调查资料。编辑者除遍访中国大陆地区的档案馆图书馆外,还曾到日本、美国、德国、英国、中国台湾等地搜寻档案与资料。《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出版,“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相关材料基本上都收集回来了”,改变了相关资料零碎,分散的状况,将为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提供坚实的史料。难能可贵的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对与“现有结论”相矛盾的原始资料,也“照原样收录,不做任何更动,提供给历史研究者”^①,这必然促进研究朝着更科学严谨和深入的方向发展。

二

中国学术意义上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开始于 1980 年代,大概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 年代初至 1990 年代末。最早有系统地叙述南京大屠杀的著作是高兴祖的《日军侵华暴行——南京大屠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这虽是普及性的读物,但开创之功不可没。随后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编写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根据已有史料对

① 张宪文:《〈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总序》,《民国档案》2005 年第 3 期,第 134 页。

南京大屠杀的过程进行了描述性研究,奠定了日后研究的基础。1997年,孙宅巍主编的50万字的《南京大屠杀》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该书“详述屠杀的背景、范畴、过程和影响,而且针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论调,进行了反驳”。^①该书在整体上代表了当时研究的高水平。刘惠恕编著《南京大屠杀新考》,(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其特点在于:“是国内第一本针对田中正明的翻案言论,系统考证南京大屠杀史实的考证体论著”。相关的论文与论著均不少,研究多集中于:1. 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研究;2. 奸淫、抢劫、纵火暴行的研究;3. 南京安全区的研究;4. 南京大屠杀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研究;5. 南京大屠杀审判的研究;6. 南京大屠杀史料的研究;7. 南京大屠杀历史影响的研究等方面。1990代末有学者对研究状况有如下评论:“我国对南京大屠杀史的系统研究……历经40余年,各种论著、图集、画册十分丰硕,但总的情况是:文章多,著作少;通俗性著作多,学术性著作少。”^②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发掘、整理与出版史料、联络学者、访问幸存者、组织学术活动、推动学术研究等方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95年,南京地区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有100多位会员加入。1997年,更在南京举行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者达150人(包括日本、美国学者),提交近60篇论文。会议体现了更多的海内外学者关注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会后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另

① 郭德宏、陈亚杰、胡尚元:《近10年来日军侵华罪行和遗留问题研究综述》,《安徽史学》2006年第1期。

② 孙宅巍:《序一》,载刘惠恕编著《南京大屠杀新考》,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页。

一个值得注意的研究机构是1998年南京师范大学建立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该中心建立后也积极开展活动，包括组织研究课题、召开各种形式的学术会议、出版学术著作、组织学生访问幸存者等。中心还创办了“中日网”(<http://www.sjhistory.net/site/newxh/>)，利用网络作为发布研究信息与学术交流的平台。

第二阶段，进入21世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有三个较显著的特点：一是重视新史料的发掘与运用，学者们普遍认识到，没有坚实新史料（尤其是核心史料）的运用就无法将研究引向深入。2005年南京大学建立了“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其首要的目标就是全面搜集史料，该所协同其他单位已经编辑出版了55卷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并于2005年12月在南京召开了“南京大屠杀史料国际学术讨论会”。相信更多的学者会利用新资料写出高水平论著。^①二是在新资料的基础上注重个案研究与实证研究，著作类如程兆奇的《南京大屠杀——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重点批驳日本“虚构派”的各种论点。孙宅巍的《澄清历史——南京大屠杀研究与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在其旧作《南京大屠杀》的基础上，以专题式的方式深入讨论问题。朱成山主编的《南京大屠杀江东门“万人坑”遗址的发掘与考证》（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则用考古发掘报告的形式展示1998—1999年间在南京江东门发现的遗址上发掘清理出的208具受难者遗骨，“经过考古学者、历史学家、法医和医学专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科学的勘察、技术鉴定和化学分析，确认为些遗骨

① 如程兆奇认为，在与日本右翼学者的斗争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不必担忧学术检验，无须免检的豁免权。”新史料的出现，“让人感到这一牵动着学术界以外敏感神经”的著名史事“讨论已成为可能”。详见其《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概论》，《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是当年遭日军杀害者无疑”。^① 三是研究视野更为开阔,有学者从单纯研究日军暴行本身及对中国受害者的身体伤害,注意到屠杀对南京市民长期的心理影响,“文化大屠杀”等。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一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代表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如东中野修道的《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新华出版社,2000年内部发行)、松村俊夫的《南京大屠杀大疑问》(新华出版社,2001年内部发行)等。这些通常被称为“日本右翼”的作品虽是“供批判”用的,但能在中国出版,使学者“兼听则明”,了解其理论、观点、方法与史料,对于全面促进大屠杀史研究的科学严谨性有重要作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也将有益于学术的发展。

三

坦率地说,任何民族之间历史上的不愉快冲突,都是“负遗产”,不利于现实的民族对话与和解。后人所能做的,就是如何将这种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南京大屠杀是铁证如山的惨案。此事件发生于日本全面侵略中国,日军烧、杀、奸、淫、抢无恶不作的时期,其后又经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有确切定论,绝对不是少数人所能任意否认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成为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有其深刻的原因。

如前所述,中国关于南京大屠杀史的学术研究兴起于1980年代初期,其时,日本因国际国内政治的变化,否认侵略战争的声音

^① 张宪文:《序》,载朱成山主编:《南京大屠杀江东门“万人坑”遗址的发掘与考证》,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兴起,而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在勃兴,两者发生激烈的碰撞。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争论也就由此而起。中国方面普遍认为,日本政府态度暧昧,默许甚至支持否认侵略战争,否认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的言行,而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或者重要象征,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在这样的社会心理之下,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甚至有“图腾化”的倾向。^①正因为如此,一个与南京大屠杀某些细节相关的日本国内的诉讼案——东史郎案,却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年参与大屠杀而向中国人谢罪的日本老兵东史郎获得了广泛的同情与支持。

1980 年代担任南京市长的张耀华先生对于推动征集南京大屠杀史料、建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开展相关研究起过重要作用。他对这些工作的意义曾有如下的表述:

我们编辑出版南京大屠杀事件专史,将历史真相重新展示在人们面前,就是为了使中日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了解两国关系的曲折历程,从而更加珍惜得来不易的今日中日友好关系,以利于中日两国关系健康顺利的发展和实现中日两国世代友好下去的目标。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是发生在旧中国的一场严重的历史事件。那时的中国,由于贫穷落后,不断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欺侮和凌辱。惨痛的历史告诫人们,“落后是要挨打的”。我们相信,重温这一历史事件,必将激发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为振兴中华,为早日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而奋发图强。^②

① 程兆奇在《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概论》一文(《社会科学》2006 年第 6 期)中指出,南京大屠杀确实是一特殊的历史事件,“但作为‘历史事件’,我觉得它不应该图腾化”。

② 张耀华:《序言》,载《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 页。

张耀华先生在这里所提示的三重意义: 1. 教育人们爱国, 振兴中华; 2. 为了中日长期友好; 3. 展现历史真相。基本上是在进入 21 世纪之前中国学者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目的(以后增加的“反击日本右翼”与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两点, 实际上也可归结到以上三重目的之中)。^① 在此目的指导下, 史料与研究以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规模之大, 手段之残忍为主体, 着力反击“日本右翼”的“虚构说”。而中日之间关于教科书、领土等现实问题的争论, 每每又刺激中国人的感情, 强化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 中日之间“对抗”多于“对话”, 对抗的结果更不利于双方的和解。

进入 21 世纪,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有些新的趋向。在资料方面, 全面而不是有选择的公开; 在研究目的方面, 有学者指出, 研究南京大屠杀并不完全是为了追究日本的责任与反击“日本右翼”, 而是要还原中国自己的“真实历史”:

研究南京大屠杀, 必须驳斥那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右翼分子, 必须与世界各地的法西斯余孽与遗少作斗争, 但我想提出: 这尚不是我们开展研究仅有的目的。我们研究的主旨应当是: 还原我们民族真实的历史, 建立我们民族自己的记忆, 把落后就要挨打, 没有国权就没有人权的道理, 告诉所有的中国人, 并且传之子孙, 永不湮灭。^②

张连红对于南京大屠杀史未来的研究也有新思考: “突破政治制约、构建学术对话平台, 并注入人类文明的视角以推动研究的国

① 陈安吉:《序言》, 朱成山主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4 页。

② 张生:《〈佛门避难记〉价值的再发现》, 载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佛门避难记》,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2 页。

际化将是中日史学工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①

2005—200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新馆的布展中,在内容方面,向前拓展到日军侵华的历史,向后延伸到对和平的诉求。“过去是单一的南京大屠杀,这次更重要的是和平的一些内容”。^②馆内同时新塑了“和平”的雕像。南京市民在悼念大屠杀遇难同胞时,也突出了和平内容。2006年“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69周年仪式暨南京国际和平日集会”上,曾有南京市民代表宣读《南京和平宣言》。

与1980年代相比较,21世纪的国际关系、中日关系及两国国内的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亚洲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中国与日本有了新的合作基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也要求中日两国求同存异,走向更全面的合作,两国面临着合则两利,分则俱损的局面。在此条件下,当初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三重目的,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1. 教育人们爱国,振兴中华。将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根源归结为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强调“落后就要挨打”,以揭示民族苦难进行社会动员,凝聚中国人的团结,曾一度是号召全社会投入“振兴中华”的事业的重要手段。现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建设成果为世界所瞩目,完全可以用国家建设成就而不是历史的苦难来激发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中国要“和平崛起”,要充当负责任的大国,对历史上所遭受的屈辱应该有宽容大度胸怀,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应该是,“宽恕,而不要忘记”(拉贝语)。如果一方面说“和平崛起”,一方面又不停地调化历史上仇恨的记忆,肯定是

① 张连红:《中日两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② 该馆馆长朱成山回答记者,《扬子晚报》2007年12月12日。

在帮助“中国威胁论”扩大市场。美国历史学者施莱辛格说过,把历史当作武器,是对历史的滥用。

2. 为了中日长期友好,防止军国主义复活。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长期的交往史上有友好的佳话,也有尖锐的冲突。通过研究南京大屠杀,揭示军国主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可以使人们更珍惜中日友好的局面。但是,这样的目的是间接达到的。其实,不断地强调两国间历史上的冲突,对双方都不是愉快的事情,结果可能是伤害而不是增进双方的感情,对友好事业有害无益。更何况,能否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完全看日本国内的政治发展与日本人民的选择,他国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当然,日本方面要承认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战争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无可饶恕的罪行,也是世界文明的悲剧。日本政府要明确承担战争责任,不要默许有人不断挑战已经形成的历史结论,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东亚各国政府在进行历史对话与和解中扮演重要的指导性角色。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现实的国家关系与历史争议问题是互为表里的。当现实关系密切时,对待历史问题就较冷静与理性,而现实冲突加剧时,则会翻出历史问题大做文章。

3. 展现历史真相,反击“日本右翼”。这应该是目前研究南京大屠杀最重要的目的。南京大屠杀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将其作为一个历史事件的还原,而非为现实政治服务,更不是要强化暴力与煽动仇恨。让研究回归学术本身。学术界能做的,就是要科学地总结历史,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宗旨,揭示真相而不是煽动仇恨,对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充分发掘资料,实事求是将理性研究的结果告诉民众。“民族主义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曾是推动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动力,但中国学者现在要避免政治影响与“民族主义史观”的束缚,不能想当然地只拷问“性质”、“责任”而

忽略细节的重要。^① 在揭示历史真相的前提下,对于研究中的不同观点与意见,不能动辄即扣帽子。对于“日本右翼”的言论,在学理层面上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进行科学的讨论,实事求是才是有力的反击。历史研究是重视实证的科学,既然坚信真相在自己一方,就不要怕相互的辩诘与讨论。应该广泛地进行学术交流,“求同存异”。

还有一点值得中国学者注意的是,南京大屠杀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但它不是抗日战争史的全部,更不是 20 世纪中日关系的全部,应该将其放到历史的背景与过程中去研究,而不是凌驾于整个 20 世纪中日历史之上,或者说是它有特别优先权。曾田三郎教授在编著《近代中国与日本》(东京:御茶の水书房 2001 年)时,特地用了“提携与敌对的半世纪”为副标题。笔者认为这确切地反映出 20 世纪复杂的中日关系,不能用一面来否定(或掩盖)另一面。可惜,用这种认识来研究中日关系的学者不多。

现在,学术界与民间做的许多事情,正朝着此方向在努力。如中日对历史问题的共同研究、中日韩三国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举办三国青少年的历史夏令营等,都是有益的工作。笔者相信,只有在尊重事实,平等交流的基础才能实现学术对话。南京大屠杀是中日和解过程中最大的一个结,当双方在这个问题能进行平心静气地对话时,中日两国在历史对话与和解方面肯定能取得成功。

(作者陈红民,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傅敏,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关于南京大屠杀过程中遇难同胞的确切数字,是一个敏感而有争议的问题。最近仍有中国学者说,“在数字问题上纠缠等于是上了日本右翼的圈套”。笔者认为恰恰相反,只有弄清数字,才是对日本右翼最有力回击。回避数字问题,等于不敢在重要问题上面与之交锋,相关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就会永远受质疑。